

# 中国体制结构转型的逻辑与路径透视

## ——基于两种经济剩余积累模式的比较性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实验班 肖磊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光辉典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提供了制度起点，也为透视中国特色体制结构转型的逻辑和路径提供了现实基础。文章将比较性地回顾体制结构转型前后两种经济剩余积累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部积累模式和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外向积累模式，二者的区别，并从开放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剩余利用模型出发，探讨外向积累模式对增长率的贡献因子，及其对增长速度、积累率与发展独立性的影响，进一步地说明内部积累与外向积累的互补替代关系，从经济史的线索中对模型的解释力进行验证。并结合课程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学习成果，创造性地将两种积累模式的资源配置性效率与制度适应性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内解释中国体制结构转换中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的内在一致性。内外部积累的机会成本平衡增进了配置性效率，同时外部积累引致的制度适应性调整和积累模式变迁对效率边界具有拓展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内外部协调的经济体制改革逻辑下，增进效率的优位政策选择。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剩余 开放型经济 资源配置效率 适应性效率

### 一、转型的动力机制：经济剩余积累模式的比较性回顾

#### （一）经济剩余理论及其主要观点

经济剩余理论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

经济剩余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相对具体的实际经济剩余，即实际产值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就其宏观经济学意涵而言，类似于总储蓄这一经济指标，就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涵而言，则与剩余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其

解释范围较剩余价值而言更为广泛；第二种是相对抽象的潜在经济剩余，即潜在产值与必需消费之间的差额——潜在产值是在生产资源被充分利用时的产值，而必需消费是指按照一定社会标准所必需的消费，这一标准不包括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和非必需的政府消费，此外，潜在经济剩余中的积累有明确的关于质的限定，特指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体系完善的积累。就二者的关系而言，由于一个社会的潜在产值大于实际产值，而必需消费小于实际消费，因此潜在经济剩余大于实际经济剩余，事实上，潜在经济剩余是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范畴，它是实际经济剩余的一种理论参照。

经济剩余分析认为，经济剩余的利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生产性地使用经济剩余是一国取得经济发展的前提，只有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实际经济剩余才能接近或达到潜在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分析着眼于影响积累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关系，其本质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学分析。由此可见，经济剩余分析包含经济剩余创造与经济剩余利用的两个过程，分别对应着一个经济系统中的经济生产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从经济剩余积累模式的角度考察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因而，在这一部分的比较性回顾中，我们将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剩余转移型内部积累模式，以及开放市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型外向积累模式，进行基于经济剩余创造与经济剩余利用模式的分析。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部积累模式：逻辑与缺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现代生产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的劳动体系，摆脱个人劳动的生理局限，实现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五个排斥的破除，从而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其生产技术变革的一面而言，劳动资料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最终形态，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只有“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使得大工业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并“得以自立”。同时，落后国家市场缺陷引致的扭曲效应会通过向后需求联系而累积，导致上游工业部门成为缺陷的交汇点，并且具有最大规模的扭曲效应。这表明落后国家要克服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并发展现代生产的前提是建立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生产方式动态变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潜在产值的提升过程与潜在经济剩余的扩大过程。

这种导向下的经济剩余创造，要求对应的经济剩余控制与支配方式与其超常

规工业化利用目标相一致，做出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结构安排。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超常规工业化战略的产物，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求国家最大限度地创造并且完全控制国家经济剩余，同时将其转移到与宏观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部门之中。国家通过控制工农品的交换渠道和交换价格，把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在价值以下，工业产品的价格控制在价值以上，借此转移农业剩余，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控制和转移过程对宏观环境的特殊安排提出了必然的要求，传统计划经济内部积累模式就成为其题中之义。

**内部积累模式与农业剩余转移**

| 年份   | 农业剩余转移<br>(亿元) | 占国民收入积累<br>额的比重(%) | 年份   | 农业剩余转移<br>(亿元) | 占国民收入积累<br>额的比重(%) |
|------|----------------|--------------------|------|----------------|--------------------|
| 1952 | 55.66          | 42.8               | 1965 | 157.61         | 43.2               |
| 1953 | 67.40          | 40.1               | 1966 | 194.64         | 41.4               |
| 1954 | 87.60          | 41.8               | 1967 | 171.75         | 56.5               |
| 1955 | 79.62          | 43.0               | 1968 | 141.30         | 47.4               |
| 1956 | 83.03          | 38.3               | 1969 | 160.58         | 45.0               |
| 1957 | 94.12          | 40.4               | 1970 | 103.92         | 33.0               |
| 1958 | 133.56         | 35.2               | 1971 | 219.18         | 32.0               |
| 1959 | 155.31         | 27.8               | 1972 | 220.31         | 34.0               |
| 1960 | 158.13         | 31.6               | 1973 | 254.02         | 34.3               |
| 1961 | 105.29         | 54.0               | 1974 | 245.35         | 31.1               |
| 1962 | 121.02         | 122.2              | 1975 | 264.52         | 31.9               |
| 1963 | 121.41         | 66.3               | 1976 | 244.67         | 32.7               |
| 1964 | 150.96         | 57.4               | 1977 | 270.95         | 32.6               |

建立在经济剩余利用方式上的传统计划经济积累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宏观特性：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常规工业化战略；第二，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四低”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环境；第三，单一公有制的所有权制度与欠发育的产权制度；第四，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传统内部积累模式的这四个主要内容具有形成上的历史因应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小生产方式的迅速变革要求与缺少外部援助和贸易条件的矛盾，使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常规工业化成为中国结构性的目标要求。主观目标与客观环境要求内部积累成为超常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其核心就是利用各种反市场的政策杠杆，全面扭曲要素和产

品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就资本品的价格控制引发的低利率与低汇率而言，资本作为中国要素禀赋相对稀缺的要素，其市场化相对价格较高，在这一相对价格引导下的企业投资，必然会导致节约资本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结构倾向，使得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自汇率角度而言，必须采取低利率手段人为压低资本品价格，保证超常规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低汇率的逻辑与低利率相似，外汇与国内资本同样稀缺，市场决定的高外部资本价格将提高资本品成本，不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此为保证重点项目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外汇价格形成，具体而言就是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就可变成本的控制而言，高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发展需要有很高的积累率，而积累率的高低又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必须压低投入品的价格，即实行低工资和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重工业的利润率和积累能力，同时，低工资支付降低了城市工薪阶层的支付能力。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必须相应降低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压低一系列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即实行压低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政策——将这四个方面相统一，就构成了传统内部积累模式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四低”的宏观政策环境。维持经济剩余支配机制的相对稳态，就必须在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上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运用反市场的手段保证经济剩余的运动方向，因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就应运而生。

受主观目标与客观环境共同作用塑造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积累模式，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新生政权的巩固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内部积累的原生动机受到抑制，而其结构偏斜和效率损失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就结构设计而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构设计背离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原生动机迫进性不突出的发展条件下继续坚持这种结构设计，会十分严重地抑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福利配置而言，与内部积累结构相适应的计划配给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对必要消费的抑制，造成积累与消费比例设计的失衡，会十分严重地抑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效率导向来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动力结构、协调结构缺乏准确的供求价格信号和竞争激励机制，会十分严重地破坏效率的增进可能；就发展空间

而言，失去农业与轻工业基础的重化工业，其发展职能是自我服务，这本身就意味着发展的一定界限，超过一定限度必然出现重化工业产品的过剩，若这种非均衡增长超过其自适应的限度而缺乏调整性的制度安排，会十分严重地压缩经济发展的空间。因而就需要对体制结构做出转型调整，就本文的观点而言，这种调整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剩余积累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创造与支配两重意涵，其中国经验就在于建立了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外向积累模式。

### （三）开放市场的内部积累模式：数量创造与制度改进

就经济剩余的创造角度而言，基于比较优势的外向积累模式对经济剩余的最大化创造具有显性的优化作用。经济剩余的积累数量一方面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主体对经济剩余的储蓄投资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外向积累模式，其经济剩余的相对创造成本最低，发展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强，因而就具有更广阔的市场份额来拓展经济剩余的积累规模，以及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为激励储蓄投资动机。同时，这种外向型积累模式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提升潜在产能上界，国际技术扩散能够有效地减少学习成本，减少经济剩余浪费，类似的逻辑也能体现在对必要消费的控制上，进口相对成本较低的消费品能够控制必要消费的总水平，降低必要消费的下界，这也极大地拓展了单位经济剩余的积累空间。就经济剩余的支配机制角度而言，基于比较优势的外向积累模式对经济剩余支配机制具有显性的调整作用，这也是体制结构转型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逻辑与路径。

首先，外向型积累促进汇率体制改革。原有的内部积累要求扭曲汇率信号，同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构建贸易壁垒，而积累模式的转变最直接地转变了这一体制形态，原有的信息失真、杠杆作用差、调节灵活度低的汇率体制面临适应性的浮动制改革，汇率市场化程度和灵活性程度提高，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提高。

其次，外向型积累促进竞争机制的建立，诱导国内市场的发育。原有的内部积累模式，市场主体的自生能力差，其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别的政策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腐败、预算软约束和寻租行为掣肘宏观经济效率，大量浪费经济剩余。外向型积累模式通过内外联动的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主体的竞争，促进竞争市场的发育，而恢复扭曲的价格信

号是竞争市场发育的重要环节，原有的低工资、低物价的计划价格体系就面临着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体制转换期两种积累模式下发展的产业通过前后向联系的乘数效应，能够扩大价格体系市场化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体制结构转型。

再次，外向型积累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改造内部金融市场的畸形性与象征性特征。从过程上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超常规工业化战略，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越过金融中介软化预算约束，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目标企业提供支持，金融的中介功能遭受削弱且多受垄断性管制；从功能上说，后赶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自然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体，而垄断性管制下的金融服务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主体，缺少金融支持的经济自然主体将面临崩溃，进一步地扼杀了效率优化与结构平衡的可能。外向型积累若要引致外部经济主体，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沟通储蓄与投资两个环节，通过中介功能与分配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与金融功能性支持相匹配。

复次，外向型经济积累促进所有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原有的内部积累模式下，所有权、经营权与行政权三者合一，产权约束的确界不够明晰，退出机制缺位，产权流通不畅，造成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一方面降低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由国有资产流失引发经济剩余的浪费。外向型积累模式发展了国有资本与外部资本的竞争合作关系，这就要求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从而明确交易边界，降低交易成本，规范交易行为，促进各经济成分形成稳定合理的收益预期，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配置路径合理有序。

最后，外向型积累对积累数量的扩大作用能够通过显性与隐形的利益补偿机制，降低改革的制度转换成本，强化改革的路径依赖。外部积累对经济主体提供两种补偿机制，一是因效率改进和经济剩余绝对量的增加提供的“收入补偿”和新的发展契机与就业机会所提供的“机会补偿”，降低经济体制转换带来的微观主体成本支付；外部积累制度改进的四种形式，即发育完全的市场价格、有力的财政金融体系、健康的外汇账目与贸易关系四者相互配合，能够增强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与稳定性，形成良好的改革预期；外部积累与体制结构转型存在内在的

良性互动，渐进式改革与渐进式开放的在纵向区域设计与横向部门布局的关联性，充分利用改革与开放的因应关系强化了改革的路径依赖，使得改革与开放循环联动，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 二、替代关系与贡献因子：开放宏观经济的剩余分析模型

### （一）分析工具的构建：一个开放宏观条件下的经济剩余模型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剩余理论，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借鉴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增长与分配的分析成果，将两种积累模式统一到同一经济体中进行经济剩余的分析，推断二者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为下一步的最优配置分析提供准备。

潜在经济剩余是潜在产值与必要消费的差值，即国民收入与必须消费的差值，消费部门包括居民消费 $C$ 和政府消费 $G$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二者的必要消费值记为 $C_e$ ，非必要消费记为 $C_n$ ，潜在经济剩余为 $ES$ 。则有潜在经济剩余的定义式：

$$ES = Y - C_e$$

根据开放宏观经济学四部门经济收入的定义，可以将国民经济收入 $Y$ 进行内外部市场的分解，国民生产总值是居民消费 $C$ 、政府消费 $G$ 、固定资本净投资 $I$ 、存货投资 $I_{nv}$ 和净出口 $EX$ 之和。由定义式和非必要消费的假设可知：

$$ES = I + I_{nv} + C_n + EX$$

这其实是对经济剩余利用模式的一个数学表达，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剩余，由三部分利用形式组成，投资、非必要消费和外部需求，对应我们前文提到的内部积累、外部积累和浪费，讨论前两种形式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就需要将二者统合入增长率定义式，并就经济剩余对增长率作出分解：

$$g = \frac{I}{K} = \frac{I}{ES} \cdot \frac{ES}{Y} \cdot \frac{Y}{\bar{Y}} \cdot \frac{\bar{Y}}{K}$$

这四个变量均具有其现实内涵，按顺序说明分别为：积累率 $s$ ，即潜在经济剩余用于积累的比例；剩余份额 $\pi$ ，即潜在经济剩余占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产能利用率 $u$ ，即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比；产出资本比 $\sigma$ ，即最大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即：

$$g = s\pi u\sigma$$

为独立比较内部积累与外向积累的贡献因子，我们做出两个假设：第一，假设政府和个人的非必要消费，即经济剩余的浪费部分外生给定，其现实原因也容易理解，一方面非必要消费有其上界，另一方面一个经济体的非必要消费与其宏观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们将非必要消费  $C_n$  和净出口  $EX$  统一规定为外生需求  $D$ ， $D$  只受  $EX$  影响；第二，假设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是线性的  $i$  倍关系，且  $s$  可以分解为内外部积累率  $s_1$  和  $s_2$ ，我们将其称之为外部投资比，这一也具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这里不再赘述。经过这两个假设，潜在经济剩余可进一步表示为：

$$Y = C_e + (1 + i)s\pi Y + D$$

$$ES = \frac{D}{1 - (1 + i)(s_1 + s_2)} = \rho D, \quad \rho = \frac{1}{1 - (1 + i)(s_1 + s_2)}$$

其中， $\rho$  为外生需求乘数，将这一概念引入增长率分解的各其他变量之中，可以得到：

$$\pi = \frac{ES}{Y} = \frac{\rho D}{C_e + \rho D}, \quad u = \frac{Y}{\bar{Y}} = \frac{\rho D}{\pi \bar{Y}} = \frac{C_e + \rho D}{\bar{Y}}, \quad g = \frac{(s_1 + s_2)\rho D}{K}$$

## (二) 简要结论与经验证据

对上述几个表达式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潜在经济剩余  $ES$  与积累率  $s$  正相关，也与外生需求  $D$  正相关，且剩余份额  $\pi$  同样与积累率及外生需求正相关。

第二，由于产能利用率存在上界，不能大于 1，即  $u \leq 1$ ，因此需要根据产能利用是否充分来分情况加以说明。当产能充分利用，即  $u = 1$  时，给定必需消费不变，外生需求与外部积累率的增加必然要求内部积累率同时下降，而外生需求和外部积累率的减少必然要求内部积累率同时上升；当产能利用不充分，即  $u < 1$  时，给定必需消费不变，积累率或外生需求的增加都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且一方的提高不要求另一方降低。直到产能利用率达到其上界时，则出现前一种情况，即一方的增加必然要求另一方同时降低，以保持产能利用率不超过其上界。但是，在产能利用率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时，即使并不达到其上界，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替代关系，这是我们后面效率分析的基础。

第三，可分情况讨论外生需求对积累速度的影响：在产能充分利用时，外部需求和外部积累的上升必然内部积累，且总积累率下降，而由于经济剩余总量不变，因此总的结果是积累速度下降；当产能利用不充分时，外部需求的增加就不



会挤压积累，积累率不变，因此总的结果是积累速度上升。因此，外部需求对积累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影响方向取决于产能利用的情况。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会更倾向于讨论具有显性替代关系的情况，因为一个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基本上相对固定。

第四，无论产能利用是否充分，积累率都对积累速度有正向影响。并且，当外生需求下降时，内部积累率的上升可以弥补外部需求和外部积累缺位对产能利用率和积累速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掌握积累的主动权能有效应对外部需求与外部积累的不确定性，经验事实也说明，尽管外部积累对经济剩余的绝对数量和利用模式具有正向的塑造作用，但高度依赖净出口的小国往往因为缺乏自主投资空间和投资能力而陷入困境。

我们简要地将对外开放以来的内部积累率 $s_1$ 、外部积累率 $s_2$ 、外生需求乘数 $\rho$ 、净出口相对规模  $d = D/K$  与增长率  $g$  的关系进行经验性的比较：

相关影响因子评估

| 年份          | 积累率   | 外部积累贡献率 | 外生需求相对规模 | 外生需求乘数 | 积累速度  |
|-------------|-------|---------|----------|--------|-------|
| 1978 ~ 1991 | 48.8% | 0.075   | 3.25     | 0.05   | 7.3%  |
| 1992 ~ 2000 | 54.4% | 0.218   | 3.31     | 0.05   | 8.4%  |
| 2001 ~ 2011 | 59.7% | 0.072   | 3.15     | 0.06   | 10.6% |
| 2012 ~ 2020 | 74.8% | 0.022   | 4.61     | 0.03   | 9.8%  |

注：本表格部分数据来自于已有测算，补充测算数据源：中国统计年鉴、WDI、W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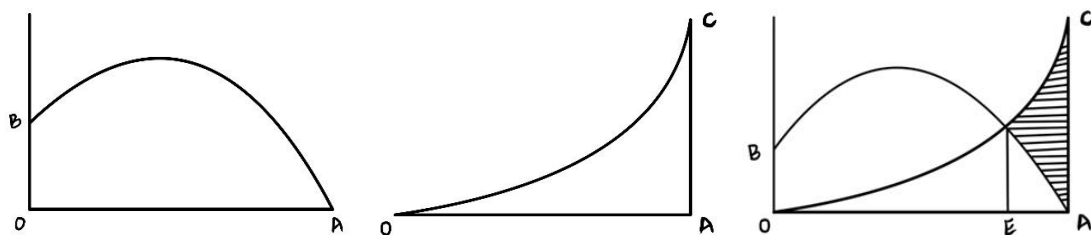
根据四个时段的经验分析，中国的积累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并处于上升状态，外生需求相对规模不断扩张，外部积累贡献率占据一定份额。然而，这种回顾性的梳理也暴露了外向型积累自身存在的劣势：首先，外部积累与外生需求虽然在总量上拓展了经济剩余的上下确界与积累空间，但是其在国民经济全局的影响力仍然较小，影响作用受限制，并且伴随着我国实体经济体系的不断优化，内部积累的自生性逐渐强化，外向型积累的相对优势趋弱；其次，外部积累与外生需求具有影响力强、波动性大的特点，受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国际关系扰动、贸易保护与逆全球化、疫情为代表的非传统性风险的影响强，对经济剩余积累的贡献率稳定性差；最后，外向积累对应的比较优势路径是静态效率最优的发展路径，过分注重比较优势会忽略长期增长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变化，影响中长期的发展优势培养，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并处于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低位，丧失自身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经济甚至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依赖，也会对内部原有的经济

稳态造成不可逆的冲击。因此，在一个开放的宏观经济体中若要寻求有效的体制转换与长期发展路径，就必须在内部积累模式与外向积累模式之间寻求效率最大化的平衡点，并做出效率优化的制度安排，这就构成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

### 三、效率优化的内在逻辑：基于两种效率理论的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经济剩余积累体制转换中的效率增进与对应的制度安排，丰富这一分析视角的现实内涵。效率增进一向被视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经济学家理论设计的初衷使命，围绕效率这一核心命题也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展开了具体的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性效率依据完全竞争市场的帕累托最优而界定，强调静态状况下资源的合意配置对效率最大化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引入效率理论，强调制度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动态效率更新了效率的分析范式，成为效率增进的另一种界说。就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而言，静态的资源配置性效率和动态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共同塑造着体制结构转变的效率，因而需要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讨论，这里我们借鉴当代中国经济课程中的效率增进模型。

我们已经提到两种积累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结构转型具有正向贡献性、相对独立性和共存必要性，因而二者对国民经济的资源占有量可以纳入资源配置性效率的视域进行考察。改革开放前，经济剩余几乎完全由内部积累模式所控制，这种绝对控制面临着双重效率约束，即效用上的边际收益递减约束和成本上的机会成本约束：一方面，随着内部积累控制的经济剩余数量增加，单位经济剩余边际效益递减，这种递减规律在宏观上有所反映；另一方面，机会成本，即由于严格的内部积累模式而使具有外向积累比较优势的部门不能使用该资源而造成的经济剩余损失量，随着内部积累控制的经济剩余数量增加而增加。



$AB - OC$  曲线对边际收益递减约束和机会成本约束做出了示意， $OB$ 轴表示单位经济剩余边际收益， $AC$ 轴表示单位经济剩余机会成本损失，在原有模型的基

础上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对线性进行了一些调整，即超常规工业化内部积累初期，这一经济模式能够充分组织内部经济剩余资源，因而边际收益有一个增加阶段，而后伴随制度性约束增强，递减速率增加，机会成本也伴随控制状况增加速率扩大，将双重约束统筹起来考虑，得到资源配置效率均衡点 $E$ ，防范阴影部分带来的效率损失。

就资源配置性效率来说，内部积累与外向积累应合理配置以确保整体效率最优化，将双重约束统筹起来考虑，应使得经济剩余资源量在内部积累模式与外向积累模式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就制度适应性效率而言，在体制结构转型过程中，两种积累模式的内在制度设计，以及一个经济体在两种经济剩余配置的宏观制度设计，会通过影响两种曲线的线型对均衡点的选择造成影响，在接下来的政策导向部分，我们将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给出内外部协调的经济体制改革逻辑下，增进效率的优位政策选择。

#### 四、政策导向与结论：效率增进的优位政策选择

首先，优化两种积累体制的内部结构，拓展经济剩余积累的效率边界。两种积累体制内部存在不同的结构性设计，经济剩余积累的核心是产业资本的积累，中国投资回报率与储蓄率的双高特征使得数量型积累较为容易，内外向结合的积累模式也拓宽了积累的规模，积累的数量并非中国体制结构转型效率增进的关键，关键在于产业资本积累的质量。没有产业资本积累质量的提升，国际资本间的激烈竞争将使其缺乏生存能力，难以突破国际金融化资本主导积累体制的束缚进而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体系中受到边缘化风险影响。这种质量提升，第一要求强化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转换能力，构建互补性外向积累体系；第二要求经济体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关联提升产业资本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提升资本质量；第三要求强化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机制，形成对经济剩余内涵型增长的资本金融双重支持。

其次，不失时机地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动态做出前瞻性预判与适应性调整，始终保持均衡配置点的合意位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形势剧烈变动，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收缩，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等非传统型安全风险影响持续。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动态变化必然对内部积累模式的机会成本曲线、边际收益曲线和目标函数构成影响与再塑，因而资源配置性效率的均衡点也会随之变动，这必然要求一个经济体对现实中的经济剩余资源配置进行前瞻性和适应性的调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两种积累体制的互补，增强双向积累的宏观效能。

最后，充分把握经济剩余积累模式转型与体制结构转型的内在关系，强化开放经济的制度性设计，推动改革与开放双向促进。一是要强化制度内设计，在外向型积累的拓展中推动要素禀赋的结构性改革，促进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股票市场充分发育，强化对内外市场主体的财政金融支持，推进企业管理制度、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纵深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二是要强化制度外设计，通过外向型积累的数量转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破除原有单一体制壁垒的城乡二元结构，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使得体制结构转型的红利由全体人民共享，强化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制度性配合，增进体制结构转型的福利，防范体制结构转型的风险。

文章的思路和内容多受当代经济课程讲义与相关文献启发，如有理解失位与论证缺漏，请陈老师包涵、批评、指正，期待陈老师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的交流与帮助，再次感谢这一学期陈老师的教导与支持。

---

#### 【参考文献】

- [1] 保罗·巴兰.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2] 保罗·巴兰, 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陈享光. 储蓄投资金融政治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5] 陈享光. 中国经济转轨中效率增进的逻辑与路径[J]. 经济学动态, 2009(01):14-20.
- [6]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 经济研究, 1993(09):3-11.
- [7] 林毅夫, 李永军.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03(07):21-28.
- [8] 林毅夫, 蔡昉, 沈明高. 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抉择[J]. 经济研究, 1989(03):28-35.
- [9] 樊纲. 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 经济研究, 1993(01):3-15.
- [10] 齐昊. 长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剩余利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10):91-101.
- [11] 冯海发, 李激.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J]. 经济研究, 1993(09):60-64.